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建构

——以 20 世纪 20 年代的国民革命为例

尹 钰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20 世纪 20 年代, 中国共产党通过重新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 将中国的政治腐败和社会苦难归因于“帝国主义”等方式, 成功地建构了一套“帝国主义”话语, 为中国的民族革命提供了现实的革命对象, 也使中国的国际政治秩序观念发生了范式性的转换。从此, 中国进入现代国际秩序的方式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持的“主权国家”体系并加入竞争, 而是根据世界革命的原则推翻这一现存秩序, 构建新的以德性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关键词] 帝国主义; 话语; 动员; 世界政治秩序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7)03-0019-07

“帝国主义”是对 20 世纪中国政治与国际关系影响甚巨的概念, 尽管这一概念早在 20 世纪初期就被引进到中国, 但它真正成为参与革命政治动员的极为重要的话语资源, 却是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国民革命开始的。通过对“帝国主义”的建构, 革命者成功地将中国的苦难、危机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 为大规模的群众动员提供了有力的斗争对象。这一概念也将中国所面对的“外部世界”, 从分裂、分散的“列强”转变为整体性、同质性的“帝国主义国家”, 使中国对世界政治秩序的观念发生了范式性的转换。本文所探讨的即是这一转换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其对理解中国的国际政治秩序观的意义。

一、“帝国主义”的词源梳理

英语“帝国主义”一词在 19 世纪 70 年代首次出现, 到 19 世纪 90 年代变为一般用语, “成为政治和新闻词汇的一部分”。^{[1](P64-65)} 在马克思著作中,

这个词还没有出现过(马克思逝世于 1883 年)。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 帝国主义既被视为一种政策, 也被视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即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在萨义德的文化论中, 帝国主义被视为实践、理论和态度的一个整体。《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它可以指一种政治支配和经济剥削的世界体系, 可以指捍卫或扩张绝对统治的政策, 也可以指支持帝国野心的这么一种思想意识(这一词的原意) 或者, 甚至可以指个人的侵略行为。这些不同的含义都牵涉到几个国家通过直接征服或利用少量的正规军队配合经济上的压迫, 逐渐统治大半个世界, 而在本世纪初至登峰造极这么一个复杂历史进程的不同方面。”^{[2](P348)} 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中指出, “帝国主义”一词含意模糊不清, 比如“美帝国主义”(American imperialism)一词, 这个词即使具有 19 世纪的涵义(直接代表帝国中心的政府), 它与政治的关联性也并不大, 但是这个词与经济的密切关联性仍然存在——它隐含了随经

济而来的政治、军事控制（以直接操控或间接的方式）的涵义。“新帝国主义”，尤其是“新殖民主义”这两个词从20世纪中叶开始，被广泛地用来描述经济体系的帝国主义。同时，“古老的涵义被局部改变，适用在一些‘相对的描述语’（counter-descriptions）上——如‘苏维埃帝国主义’（Soviet-imperialism）与中国的‘社会帝国主义’（social imperialism）——用以说明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政治或者经济关系的本质。”^{[3]（P.227-228）}不管“帝国主义”一词有多少种用法，它是一个贬义词则是无疑义的。

汪晖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就有“帝国”一词，指以“德性”为基础的政体形式，不过它并不常用。^{[4]（P.23-25）}近代东西方交流中，日本以汉语词“帝国”翻译西方的“empire”，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留日学生从日语中引进了这一用词。黄兴涛指出，外国传教士麦都斯所编1839年《英和与和英词典》中已出现“帝国”一词，并用来翻译“empire”。1894年，黄庆澄在《东游日记》中也使用过“帝国大学”一词。^{[5]（P.69）}李博的考证指出，1895年（中国）出洋学生编辑所出版了一本日文译著，书名就叫《帝国主义》。第二本译成中文的以帝国主义为题材的日语著作是1901年的《廿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一书，1902年中文本书名的写法与日语原著几乎完全相同，是《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这是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因而“帝国主义”的涵义是“武装掠夺”。1898年美国吞并菲律宾和1899年至1902年的英布战争，使得“帝国主义”概念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流行，而1900年西方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之后，在日本发行的汉语学生杂志和传单中都出现了“帝国主义”这一概念。^{[6]（P.162）}1901年，杨守仁发表《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一文，^{[7]（P.53-58）}其中说“帝国主义”，“其来甚远”，而西方各国联合镇压义和团，是“帝国主义恶相”的表露。此外，陈天华的《猛回头》等著作中也使用“民族帝国主义”等用法。这就是现代汉语中所用的“帝国主义”的通常涵义。

在现代汉语中，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之前，“帝国”一词如果不和“主义”连用，还是一个部分具

有褒义的词，含有强大、尊严、伟大、宏阔等等意思。清朝在近代世界体系中对外总是自称“大清”或“中国”，从不自称“大清帝国”或“中华帝国”，后者是西方人对清朝的称呼。但1916年袁世凯称帝时，定国号“洪宪”，对外则使用“中华帝国”的名称，可见，到袁氏称帝时，“帝国”仍然是一个表示尊严的词，而“帝国主义”的概念在当时的政治论述中，除了同盟会时期的革命党人偶尔使用之外，极为罕见，可以说处于使用的“休眠”状态。这一时期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称呼是“列强”，这是一个近乎中性的不带道德涵义的词。

二、“帝国主义”概念的革命性改造

使得中文中“帝国主义”概念被激活而且添加上强烈的道德涵义的是苏俄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干预。1921年年底到1922年年初，在苏俄召开了“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的中国代表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这次大会直接促使1922中共二大的政纲转向“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个理论源头。

共产国际领导人萨法洛夫在大会的报告中说：“……不可不在本会中格外提及的，更要促起大家注意的一桩事实，就是去巴结全世界资产阶级和巴结帝国主义强国的法门，并不是救助被压迫民族和半殖民地的道路。诸位中间有好多人，一年或十八个月以前，曾信赖巴黎和会，盼望这班帝国主义强盗中的一派或那派去帮助他们的，现在都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现在已经觉悟到向这般强有力者呼吁求助的无用了。”^{[8]（P.147）}他完全抓住了中国知识青年在一战后伴随中国外交中极大的挫败感而来的对国际秩序的幻灭和无助心理，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理解世界政治秩序的观念框架。参加这次大会的张国焘曾反思“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重大意义：“反对外国侵略的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本就继续不断，这是中国遭受外国压迫的自然归趋。不过当时中国朝野上下的爱国心理并不一致，也还有一种盲目排外的

顽固心理存在。即一般爱国主义和革命人物在意识上往往只是反对某一侵略事实或某一个侵略国家。在反对的方法上,也只是利用民气来力争外交上的胜利,并没有发展到发动全国人民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并进而反对帝国主义本身。”“中国革命思想导源于自强的要求,但革命的目标始终是对内而不是直接对外,而且极力避免对外。革命人物多以为如果内部革命成功,列强侵略是可以遏止的。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也以对内为主。这次大会把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联结在一起。我们讨论的结果,确认中国的反动势力只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革命运动要能有成就,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下手。这一点认识,连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也宣称是大会的重要阐明。”^{[9] (P. 193)}

可见,“帝国主义”这一话语将中国的“社会问题”和中国的“民族危亡”问题统一起来,也将中国面对的外部世界统一起来(从单独的反对某一国某一事,变成整体性地反对外部力量,而外部从分散的“列强”变为一致的“帝国主义者”),更重要的是,将中国内部腐败的政治权威与外部侵略性的力量合而为一。原来中国不管是办洋务的“自强运动”、搞政改的“戊戌变法”,还是求民权与种族平等权的“辛亥革命”,中国精英的改造目标始终是中国自身(反求诸己)而“帝国主义”这一话语完全扭转了这一思路。杨念群指出,中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形成了强烈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的主要表现是“‘中国’如何以更合法的身份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晚清到民国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目标始终是借助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理论不懈地促成中华民族在世界格局中占据自己应有的地位和获取现代国家的资格,方法主要是通过凝聚民力、民意、民心,鼓动上层政治体系的设计和改造,由此达致制度变迁与国家富强的现代化目标。”^{[10] (P. 300-313)}但是,“帝国主义”这一话语将他们的改造目标指向了外部的世界政治秩序,通过这种中国与世界的同时改造,中国将以不同于“与列强竞争而获取平等地位”的方式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晚清以来,中国总是在“天朝”观念(以德性为基础的世界政治秩

序观念)的框架中被动地抵抗外部世界的入侵,后来逐渐接受了以权力为基础的世界政治秩序观念(主权国家观念)而“帝国主义”概念具有强烈的道德贬义,因此“反帝国主义”这一话语是一种德性话语,中国通过这一概念重新定义了它面对的外部世界,接受了一套全新的世界政治秩序观念,认为以权力为基础的世界政治秩序(资本主义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崩溃。

三、“帝国主义”的建构与“国民革命”

中共二大全盘接受了“帝国主义”理论,但这种目标在中国实际政治中的确立,却经历了一个话语争夺的过程。首先中共自身对“帝国主义”这一话语就感到陌生。李达回忆道:“1922年3月第三国际拍来一份英文电报,主张中国应干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当时我们不懂国民革命是什么。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国家,……二大上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在此之前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11] (P. 17)}统一党的内部思想或许还比较容易,而对外的宣传,让分裂的知识精英们接受这一套新的话语,则面临着许多挑战。

葛萨廖夫在《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1926年)中讲述“帝国主义”话语在国民革命初期遭到的“抵抗”:“中国共产党首先决定向国民党提出最迫切的问题,加以研究,然后作为当前的战斗口号来广泛宣传。提出的两个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这两个国内和国际性质的口号,概括了中国社会结构中一切活跃的东西和当前的严重问题。对广大群众来说,这两大口号好比中世纪所发现的新大陆一样,甚至被称为‘中国社会结构最上层’的知识分子对这两个口号也不知道,因此在取得人们相信以前,党必须进行广泛的宣传,为使这些口号得到承认而努力。”“宣传在社会下层和中层阶级中进行着。说起来奇怪,党却被迫的去向社会上层人物和大学教授之流进行论争。……第二个口

号,‘打倒帝国主义’,却不那么容易了解,更不容易接受,就在革命的圈子里也都遭到猛烈反对。前边提到过的胡适,在他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申述自己的主张,大意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帝国主义反而对中国做了很多好事。它对中国人很好。所谓压迫问题根本不存在。胡适的意见不仅代表中国上层知识分子,而且和中国社会上好些人的意见相符合。”^{[12] (P 471)}陈独秀在三大的报告中也说:“我们是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下工作的,打倒军阀的口号已经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响应,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党员应该更加注意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13] (P 169)}

在这两年里,中共致力于将“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现实对接起来,使“帝国主义”这一话语获得真实的内容。为了建立这种新世界政治秩序观念,中国共产党开始重写中国近代的历史。近代以来历次中外冲突或者被解读为对抗外部帝国主义,或者被解读为与外部帝国主义的妥协和合谋。

例如,原来被知识精英所鄙弃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第一次获得了超乎寻常的赞颂,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完全颠倒了原有的认为其是“愚昧、盲目排外”的历史叙事。国民革命中,中共每逢“九七”都会发起专门的纪念,并且阐释义和团的新的“反帝”价值:“义和团运动的意义——是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原始的农民暴动,缺点不过在乎民众不知道反抗运动的方法及策略,如迷信及结合满清反动贵族等。义和团运动与五卅运动的比较——五卅运动是原始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义和团)二十六年来发展进化的结果。”^{[14] (P 8)}对于其宣传,基调是“九七纪念是义和团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失败、亡国辱种之辛丑条约成立的日子。第一,我们须替义和团宣雪其二十余年来被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所加之恶名,洗刷中国一般人对于义和团运动之错误观念。第二,我们须分析在义和团运动以前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与其侵略情形,以证明义和团运动不是单纯的民族仇外运动,而是农民群众受了帝国主义压迫之一种反抗运动。第三,

我们须分析辛丑条约对于中国之影响,以证明自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之二十五年中,中国无论政治经济各方面实已完全变成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第四,我们须认识义和团的革命精神,并从其失败中所得教训,以确定中国民族解放的新道路。”^{[15] (P 362)}这种宣传在城市中和知识精英中很有效,而面对农民群体,则需要更为复杂的宣传,需要将“帝国主义”与农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需要创造一种真实的表达。

Marjanne Jorgensen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话语如何通过表达来建构“真实”:一场洪水冲垮了堤坝,这一事件是不依赖于人的思想和言论而独立存在和发生的事件,但是人们马上会对此一事件赋予意义,这时它就不再是外在于话语的事实了。大多数人将之归因于古往今来都有的自然现象,因而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会将其归因于“厄尔尼诺现象”,是气候的反常,因而绿色和平和环保等观念得到肯定;而另外一些人会认为这是一场“人为的事故”,是因为政治腐败导致的“管理不善”,致使堤坝没有得到良好的修缮与管理;甚至也有人会认为这是上帝或者别的什么神灵的“启示”。总之,一个物质意义上的“事件”通过话语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话语实际上将导致“行动”,在此一事件中,第一种话语导致“不作为”的任其自然,第二种话语将导致行为者支持绿色环保运动,第三种话语将会引起政治社会运动,第四种话语将巩固宗教信仰与行为。”^{[16] (P 9)}在国民革命中,中共要将“帝国主义”概念传达到一般的乡村社会,就不得不借助于各种日常生活“事件”,赋予其特别的涵义。

1925年夏季,湖北普遍发生大旱,此时,湖北党、团组织发出宣传纲要,指示党团员“利用此次全省旱荒,从政治经济制度的罪恶去解释旱荒的原因,使农民确认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乃至地方劣绅土豪、地主财主之罪恶,并应相机组织各种团体(如农民协会、民食维持会、平菜局)为农民实际生活利益而奋斗。”^{[17] (P 85)}在农民习以为常的生活世界中,灾害就是“老天爷不赏饭”,而在新的话语中,这种事件被表达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所造成。1926年夏季

江西的水灾事件中,江西党团组织的宣传大纲中更是详细指示了如何将水灾归因于帝国主义与军阀统治。大纲首先指出:“水灾之形成,深中宗法社会之毒,神经麻木不仁的江西民众,尤其是农民,一定迷信此水灾系天灾祸人,无可奈何的一回事情!这种大错而特错的思想若不严加洗刷,极力矫正,便危险万分!”大纲要求党团员在宣传时告诉民众,真正的原因是军阀与帝国主义,因为“军阀年年向人民诈重税专以饱自己私囊,延长战争,丝毫不顾及农民的利益——不疏通河道,以利水源;不培植森林,以节雨量;不赔补堤防,以防溃决。而农民既受军阀重税的剥削,更加以种种苛捐杂税之负担,生活日趋窘困,何能有疏通河道、培植森林、赔补堤防之资,因此,雨量多,而水灾频临矣。”而军阀之所以如此不顾民众死活,则是因为这帮军阀只知道“为帝国主义利益与自己地盘而战。”^{[18] (P 313)}用另外的话来说,军阀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代言人”,中国的农民被剥削,是“通过军阀而向帝国主义进贡。”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建构主义或话语理论和话语分析并不认为“事件”本身不存在,或者“真实”(reality)不存在,而是强调,这种事实都必须通过表达来呈现,而不同的话语有不同的表达,将引起不同的行动。在湖北和江西的水灾事件中,水灾旱灾无疑是一桩物质意义上发生的“事件”,农民的痛苦也不可否认,但将这种痛苦归因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而不是“天意”或“自然”,就是一种全新的理解世界的观念框架,是“帝国主义”这一话语的实践意义,也是它对于革命动员的巨大作用。它将农民的痛苦揭示出来,并引导其指向统治秩序与外部力量。如此,抽象的、存在于千里之外(租界)、万里之外(各国)的外国势力和中国农村的现实痛苦联系起来,“帝国主义”这一话语获得了现实的解释力。

不过,帝国主义这一话语深入农村,并不是原封不动地被农民接受,而是产生了怪异的话语扭曲。到了国民革命的农运高潮期间,党的报告中承认:“还有一个更为普遍的口号,在一般知识分子看来,简直是笑话,即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平等’,农民口中所说的不平等条约不是什么南京条约、辛丑

条约,而是关于苛刻争取地租的‘佃约’,如最流行所谓‘东七佃三’及‘无息押金’、‘田鸡’、‘田鸭’、‘田蛋’、‘田草’,逢时逢节‘送人情’给地主,遇地主婚丧,有作工不受工资的义务等苛例陋规。这些在农民尤其是贫农以为便是革命政府所宣传要废除的不平等条约……”^[19]

“帝国主义”话语的建构还通过反对“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而得到有力的支援,自义和团运动之后沉寂多年的“反洋教运动”在国民革命中居然又激活了。这一场运动和“帝国主义话语”的建构密切相关,还和中国共产党争夺青年学生有关。^{[20] (P 399)}中国共产党从国民革命一开始就确定了反基督教为重要斗争目标之一,很多地方党团组织还在内部组织中专设“反基委员会”,从事这一运动。通过将基督教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再一次得到现实的印证。例如中国共产党散发的《南京非基督教大同盟传单三则》(1925年12月)中以问答的形式阐释基督教和帝国主义的关系:

问:外国人既然想亡我们的国家,为什么又要费许多钱设教堂开学校,招收教徒呢?

答:他们却是慈悲得很,不过是假的吧?倘是真的慈悲博爱,那么去年五卅事起,他们何不发个公电,说句公道话呢?好比两个强盗,想来抢掠我们家里的东西,因为道路不熟又恐邻人来干涉,于是一个强盗就去买了许多礼物,扮出一副和善面孔来拜望我们,一面劝我们要仁慈博爱,说“现在外面很是平安,你们不妨把门户开放”;一面察看各方道路去报告另一个强盗,叫他乘时来抢。这两个强盗,一个好比基督教士,一个好比帝国主义者。那么那个送礼给我们的强盗(基督教士)还是好人呢?还是恶人?^{[21] (P 42)}

这种话语的建构非常成功,使得各地基督教不得不辩护自己不是“帝国主义”,如湖南湘乡的福音堂就很惶恐地起来辩驳,一再宣言,说明自己“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先锋队”。^{[22] (P 160)}

在城市中,“帝国主义”这一话语通过一次次的

“事件”被迅速建构完成，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一个关键事件。瞿秋白指出，在五四运动期间，人人都在谈论社会主义，1925年之后人人都在谈论阶级。^{[23] (P 309)}这是因为这一“事件”被建构为帝国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之后，“阶级”和“帝国主义”等词迅速获得了现实的说服力。1925年6月19日，张申府在《语丝》第35期发表《帝国主义等》一文，表达自己的愤慨：“我不知道我的爱国程度怎样。我总觉得，这一次上海以及汉口的暴杀的事情，并不只是中国的耻辱，乃是人类的耻辱。事情的根本责任乃在人性与制度。人性与制度不改，这种事情是常要有的。那天国民大会，我也是参加的一个。也自制了一个小旗儿打着。我的旗子是两面的。一面写的是‘打倒帝国主义’。一面写的是‘痛雪人类奇耻’。”^{[24] (P 185)}1925年6月新潮社的其他北大结业生，包括文质彬彬的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等，撰文写诗要求血债血偿，洗脱耻辱。那些向来不关心政治的比较平和的教授们，现在也接受了“帝国主义”的口号，将反对的对象指向了当时的国际秩序。

1925年，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总结道：“我们政治的宣传，自一九二三年起，即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个口号。在一九二二年与一九二三年间，‘反对军阀’已成了全国普遍的呼声；到一九二三与一九二四年间，列强对华进攻日急，全国知识阶级中进步分子，已采用‘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最近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等处，已渐渐有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发生。”^{[13] (P 244-245)}

国共合作一开始，国民党尤其是“左派”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一套话语。哪怕是后来被定性为“右派”的蒋介石。当他1924年还是“左派”的时候，在黄埔军校演讲道：“……军阀所以能够在国内作恶，都是帝国主义者怂恿他的；帝国主义者所以能够侵略中国，也是全赖国内的军阀做他的走狗。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国内的军阀，帝国主义者便不能在中国立足。所以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者，首先就要打倒军阀。”^{[25] (P 102)}1937年，抗日战争的前夕，国民党CC系的重要骨干，也是蒋介石的重要笔杆潘公展，

撰写了《十年来的中国统一运动》一文，开篇即说：“中国本是次殖民地的国家，蜘蛛网似的列强势力交错于整个中国，列强为着取得在中国的优势，往往伸出干涉的魔爪，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26] (P 1)}这里如果将“列强”换成“帝国主义”，就可以看到其文本结构和中共所阐释的“帝国主义”如出一辙；国民党之所以不再用“帝国主义”一词，是因为“反帝国主义”话语已经成了中共革命话语的“标签”；国民党拒绝和共产党“说一样的话”，却无法否认他们分享着和中共一样的“反帝”话语。

不得不说，国民革命中最主要的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建构最为成功的，也许还是“帝国主义”。当中国的上层知识精英和底层民众都普遍接受“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时候，中国对于世界政治秩序的观念彻底改变了。

新的观念框架中，中国现在面对的外部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不正义的秩序。这种对外部世界的“整体性”的看法，是中共在建构“帝国主义”时所赋予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五卅惨案之后，中共的宣传策略中要求党团员“注意纠正‘缩小’、‘速了’、‘单对日或英’、‘此事为外交问题、法律问题、地方问题’等等流行的错误见解。”^{[17] (P 84)}与此不同，部分“国家主义派”则拒绝这种整体性的“帝国主义”概念。五卅运动之后不久，《醒狮》第2期上曾琦撰文道：“今世界亦但有‘英吉利资本帝国’、‘法兰西资本帝国’、‘美利坚资本帝国’、‘日本资本帝国’；无所谓‘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何则，彼等之厉害冲突，固无日不在暗斗之中也。所谓‘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乃自实行共产主义之苏俄发出，彼以共产之眼光观察世界列强，根本制度相反，自宜视为一丘之貉……”^{[27] (P 391)}然而，虽然他们反对整体性的帝国主义概念，他们却同样在运用“帝国主义”的概念及一整套话语。

在帝国主义话语和反帝国主义话语中，现代中国进入国际秩序的方式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持的“主权国家”体系并加入竞争、取得平等或优越地位，而是根据世界革命的原则推翻这一现存秩序，构建一个新的以德性为基础（社会主义

国际性原则)的世界秩序。在新的秩序中,中国将有可能因其革命性而取得世界中心的地位。在这种

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的许多重大国际政策之观念根源。

[参考文献]

- [1]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帝国的年代[M]. 贾士蘅.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 [2] [英] 戴维·米勒等.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 中国问题研究所等.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 [3] [英] 雷蒙·威廉斯. 关键词[M]. 刘建基.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 [4] 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 [5] 黄兴涛. 文化史的视野[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0
- [6] [德] 李博. 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M]. 赵倩, 王草, 葛平竹.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7] 杨守仁. 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A]. 张枏等.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C].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0
- [8]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9] 张国焘. 我的回忆(上册)[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3
- [10] 杨念群. “危机意识”的形成与中国现代历史观念的变迁[A]. 王笛. 时间·空间·书写[C].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 [11]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12] “二大”和“三大”[Z].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13]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C].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 [14] 上海区委关于“九七”纪念运动的宣传大纲(1925年8月29日)[A]. 中央档案馆, 上海市档案馆. 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 中共上海区委文件, 1925—1926年)[C].
- [15] 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九七”纪念的宣传大纲(1926年9月3日)[A]. 中央档案馆, 上海市档案馆. 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文件, 1925年8月—1927年4月)[C].
- [16] Marianne Jørgensen. 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ory and Method[M].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2
- [17] 团武昌地位报告(第九号)[A]. 中央档案馆, 湖北省档案馆. 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C].
- [18] 江西水灾区域农民运动宣传大纲(1926年)[A]. 中央档案馆, 江西省档案馆. 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年)[C].
- [19] 湖南农民运动真实情形——湖南民众团体请愿代表团的报告[J]. 向导, 1927(199).
- [20] 中央档案馆, 湖南省档案馆. 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群团文件, 一九二五年)[C].
- [21] 南京非基督教大同盟传单三则(1925年12月)[A]. 中央档案馆, 上海市档案馆. 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南京、无锡、苏州、丹阳、徐州, 1925—1927年)[C].
- [22] 团湘乡特支非基部致团中央——非基运动情况(1925年5月22日)[A]. 中央档案馆, 湖南省档案馆. 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群团文件, 一九二五年)[C].
- [23] 瞿秋白. 国民运动中之阶级分化[J]. 新青年 14卷, 1926(3).
- [24] [美] 舒衡哲. 张申府访谈录[M]. 李绍明.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
- [25] 秦孝仪.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M].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4
- [26] 潘公展. 十年来的中国统一运动[A].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十年来的中国[C]. 上海书店据1937年商务印书馆版本影印.
- [27]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C].

(责任编辑 齐琳)